

玉渊杂谭

北大文学院今年新开办了一个“作家班”，近来颇受褒贬。不少人批评这种把作家当罐头来批量生产的方法，认为是噱头。

这是人们对天才一种不正常的迷恋情结，对作家未免苛刻。真正的天才是造化神来之笔，只可传诵，不可效仿。成为作家首先需要天赋，但天才不去打磨，只能变成那个挨家挨户吃宴请而不学无术的“仲永”，纵然众人矣。

天赋之外，一个作家的成长、成熟需要很多条件，比如一间安静的书房，一群

“作家班”有助于作家学者化

良师益友，一些展示作品的平台，再比如更多的空闲时间，更多的体验和采风……而作家文学生命的长短，不仅仅在于激情和才华，也在文化底蕴的深厚与否。

文学创作需要才华和灵感，是一种思维创造，但多数作家也必须承认，它并非没有技巧和规律。学习和掌握技巧并不是什么丢人，只不过，成功的作家能驾驭乃至超越了技巧和规律，而平庸的作家却被它们驾驭了而已。

“作家班”其实是一种俗化的说法，容易引起“流水线”这样的联想。细究之，

北大这个班是一个比较正规、正统的“文学创作”方向的硕士专业，不仅邀请了当前知名作家亲自指导创作，还把三分之二的课程比重都放在了文学理论和文学史上。比起25年前该校和鲁迅文学院合办的“作家班”来说，它带有明显的学术色彩。

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北师大的文化担当和办学远见，它希望培养一些学者化的作家或者创作者。人们尽可以去担忧这个班能否办好，但不应否定这种努力。无论从现代化进程的角度，还是民众文化素

质提高的角度，学者化的作家都将会更加符合社会需求和潮流，像上个世纪那一批昨天还在背锄头或者下车间，今天就名动天下，才华四溢却未受过系统教育因而文化根基不深的作家，是特殊时代背景的产物，不应再流进他们“成才”的模式了。

细心的话不难发现，走到今天，这一代作家不同程度出现思想不跟趟，创作不灵光的现象，即便其中一部分人不甘寂寞或无法寂寞，但不是郑重其事地老调重弹，就是满腔诚恳地拍手鼓掌，从不见观点，对社会已乏有贡献，成为“被边缘化”

文·闫艳华

的“主流”作家。这其中固然有年龄自然老化而造成的江郎才尽，但另一方面，也暴露出底蕴不足的缺陷，足以让人意识到文化修养对一个作家艺术生命长短的重要性。

近年来时代变化，学者化、思想型的作家已经在受欢迎，因为他们创作的厚度和广度等都要更胜一筹，民国文人热应该也是这种需求的一种体现。民国时期的文人普遍是学者兼作家，更令人倾倒。所以，教育系统为作家成长做点事，不必要喝倒彩。

乐享悦读

《2018》：科幻在现实之上

文·刘英团

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·托夫勒曾说，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，人们必会将目光转向未来。2018年，人类世界会怎么样？在《2018》中，中国科幻第一人、九届银河奖得主刘慈欣成功地

将极致的空灵和厚重的现实结合起来，并对未来的人类社会规则进行了精彩的假设。譬如，人类社会拥有了可以改变基因延长寿命的技术，通过延基，人类寿命可达300年。这项技术在五年前开始商业应用，现在却演化为一场波及全世界的社会和政治灾难，原因是它太贵了。在这里，一个人的基因价格相当于一座豪华别墅，只有少数人能消费得起。譬如，网络虚拟社会已经极其庞大，实体货币逐渐废除，虚拟货币正在兴起。不但如此，虚拟的网络国家还在提出申请加入联合国。在这种风云变幻的大背景下，人心动荡，前途未卜，男主角盗用公款准备延基，而正当他打算向女朋友坦白自己只筹集到一个人延基费用的时候，却发现女朋友早已打算利用另一项技术——冷冻，休眠到100年以后……

现实在荒诞的科幻之上，正如很多人都说过的一句俗话，“现实比小说更荒诞”。刘慈欣的作品对现实的反思，对权威的批判，为看似天马行空的科幻世界注入了关于人性和道德的严肃思考。手捧刘慈欣的最新力作——《2018》，我不得不为刘慈欣丰富的想象力所叹服。这部作品所展现的是我们的文明在宇宙中能经历的一切，苍茫寥廓而又细致精微。黑暗的森林有严酷的法则，也有生存的希望。刘慈欣带给我们的震撼、感触和思考，在这里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维度。尽管有不少论者批评刘慈欣的作品缺乏“人文关怀”，什么爱，什么恨，什么智慧，什么诗意，什么信念，什么道德，什么宗教，什么文明，在刘慈欣笔下都成了随时可以舍弃的尘埃和慧尾。但是，正如南方都市报的罗金海先生所言，“纵观整个科幻世界，包括阿西莫夫、克拉克、海因莱因这样的大师，也没有留下特别鲜明的人物形象……在他们心中，个体已经被族群所代替，族群就是个体。”所以，“不必强求一个科幻作家去挖掘人的内心，这是严肃文学界在做的事情，他们有一个上百万的创作群体，并且占据了文学主流语境。科幻是飞在天空的航天器，不必要求它像甲虫一样在地上爬行。”

科幻文学是人类非理性又不合逻辑的荒诞图景，作者所表现的是荒诞中的现实，又是现实中的荒诞，让人们不得不沉入到深邃的哲理思考中去。在《2018》中，刘慈欣把破碎的现实案例用真实的环境组合成一组真实的情节，穿越时空、时间、在本质上是自相矛盾的，甚至是对立的冲突的。但是，这正是人类困境时所作的异于常态的表达，把扭曲变形的现象组合成现实的主题，把现实生活中的细节情景、放大和缩小描绘，用夸张、荒诞的形式让人们从麻木的现实感觉中分离出来，并试图恢复人类对生活的感性、感觉、触觉在虚构中重新创造一种新的视觉秩序。读完刘慈欣的《2018》，我一直在想，一个良性的社会，一个良性的社会生态环境之下，人们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，人们也可以满足自己的欲望。但是，人性不能丢失，人性的光芒不能磨灭。

影像空间

用生命绘制地图的人们

——观电影《新地岛》

文·郑军

1596年，荷兰探险家巴伦支带领探险队北上冰海，试图找到一条通向东方的航道。他们在新地岛北面遭遇冰封，木船毁坏，只好在冰雪覆盖的岛上度过极夜。第二年，身患重病的巴伦支死在新地岛上，幸存船员回到荷兰。他们发现，当地人正在庆祝另一位探险家所寻找到的南方航线。

这是2011年荷兰人制作的史诗电影《新地岛》的主要情节，片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巴伦支。翻开世界地图，新地岛西面的大海就以他命名。不过，电影制作人没让巴伦支当主角，而是用一位随船作家的视角来描述他。

以科技史为题材的电影属于科技文化电影的一部分，《新地岛》体现了这个类型片的典型特征。什么样的观众听到“新地岛”或者“巴伦支”这两个名字能对电影产生兴趣？当然是有一定历史地理知识的人。

与《地心引力》这样较为纯粹的科幻片类似，《新地岛》的故事核也是人与自然做斗争。一群海员如何在冰天雪地里求生，成为影片最大的悬念。而电影中人与人的冲突，比如男女主人公为恋爱而冲击门弟观念，作家男主与文盲海员之间的“文化冲突”，巴伦支与船长的矛盾，这些基本上都是副线，只起到丰富电影情节的作用。它们中任何一条都不足以取代人与严寒的冲突，进而撑起这部电影。

影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科技背景。欧洲人冒着生命危险去寻找航道，只是为了与中国、日本和印度搞贸易。当时欧洲人识字率只有几个百分点，船员都是文盲。影片所描写的这次航行既没有发现新岛屿，也没有找到新航线，这让观众颇觉失望，但这正是巴伦支当年的探险史实。

2012年，笔者的作品《西北航线》出版，描写的就是这条航道。当年，欧洲人为了贸易，以生命为代价在冰隙间寻找它。现在，这条航道上过半船只都服务于中欧贸易，游客还可以乘坐破冰船在巴伦支海上观光。回头去看当年那些用鲜血和生命绘制地图的先驱，想想在没有电、更没有无线电的情况下，他们要克服怎样的困难在北极圈生存下去，仍然会令今天的我们感慨万端。

随想随录

我在“梦想”时是个十足的现实主义者。比如我从来不会梦想有一天这个世界上不再有小偷。在我看来，小偷的职业比警察的职业还要古老，且势必与人类的历史相伴相随。我的“梦想”只是有一天，小偷也有小偷的规矩，也有小偷的底线，古语所谓“盗亦有道”是也。

听说，一学者1980年代最后一次考研究生时，在去考场的公共汽车上不幸遭遇一窃贼。那时贼已得手，将一信封扒窃过去，而这位先生却丝毫没有知觉。他打开信封一看，却无分文，仅一张准考证而已。他也可以悄然下车，将那张准考证一揉一扔。但他没有那样做，而是不忍心坏了一书生的前程，冒着被喊“捉贼”的风险将信封递还了物主，还不失幽默地提醒一句：“老哥，看看丢啥不丢？”这场奇遇造成了30岁的小知青以后生活和命运的转折。

如今，再想寻这样的“古风义贼”，安



艺苑

红枫似火 (摄影)

鱼儿

文心走笔

闲读北京

文·四九

有人说，动物也有感情，也有灵魂。不过我想，即便如此，人还是比动物高明，因为只有人才有回忆，又因有了回忆，生发了思恋。有些东西分明不在身边，却时时出现在眼前，看似姗姗而来，却又擦肩而去，这便是思恋。陷入思恋的人是幸福的，因为在思恋中，一切都很好，也不知道是美好惹人思恋，还是思恋使之美好。

这世上最经不起细算的事物或许是



时光。不知不觉，已在北京生活了十多个年头，柴米油盐的平淡日子，让我与这座城市牵上了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偶或离开数日，竟也会萌发若有若无的思乡之情。正如谢冰莹先生说，住在北平时还不懂得怎样，一旦离开她，便会莫名其妙地想念起她来。无论跑到什么地方，总觉得没有北平的好。

郁达夫先生也说过，关于一个曾经住过的旧地，觉得此生再也不会第二次去长住了，身处于远离的一角，向这方向的云天遥望一下，回想起来的，自然也同样是它的好处。他说的，是北京。

北京的独特，在其悠远的历史。史书中的北京又大半与皇家有关。皇朝时代的北京城，本就是皇帝的家。皇帝的日子其实过得很累，他要管尘世的芸芸众生，他要和喜怒不可测的上天打交道，四时八节不可少了孝敬，当然，他还要打理自己的家事。京城里这些“坛”啊，“宫”啊，“园”啊，本就是皇帝过日子的地方。生活在这座城里的皇帝太多了，仿佛这座城市生来就是做皇城的，那

些没在这儿待过的皇帝，总让后人觉得不那么正宗。

百余年前，星移斗转，金冠落地，皇城成了“故宫”，一切皇家风范凝成了一幅静止的画。到北京的游客，多半会去故宫、长城、十三陵，从故去王朝的残垣断瓦中咀嚼历史的滋味。

其实，所谓历史，无非过去人之生活，帝王将相，不过是其中的点缀。几百年抑或几千年，在人类历史长卷中只是白驹过隙，又如草蛇灰线，后人执一斑而欲窥全豹，本万无可能。生活是摇曳生姿的，史迹自然也风仪万千，最动人处又往往不易为人察觉。没有了皇帝的北京，多样的文化愈发繁盛，像千百条小溪流，蜿蜒蜿蜒汇集到一处，渐渐流散渗入，敷衍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洼地来。未经修葺的野长城、卢沟桥上的石狮、国子监的残碑，乃至旧城楼上的燕子窝、宫墙缝里的野草根、四合院里的老槐树，滴水沧海，显现的才是真实的故都景致。

繁华的北京、喧闹的北京、古朴的北京、雅致的北京，静静地凝结在曲折的胡

同、酸味的豆汁儿和声声的吆喝之中，有时候觉得，似乎北京的一切本该是这样的。千百年的文化传承最终沉积成了老北京人板有眼、不可差了丝毫的精致生活，酿出了这股活泼泼的京韵之水，滋养着文人墨客或寂寥或幽深的心情。

城市确是文化的容器，但文化绝不仅仅是城市。京韵悠悠，固在皇朝气派、百姓气象，更在眼中的远山，头顶的层云。拨开凡俗生活的面纱，风景的主角永远是山水风雪，人事变迁无非是它们最好的背景。

北京的西北淡淡地有些山峦，总须晴日方能看见，而北京的晴日又总是带着微风，风又恰自西北而来，于是，让人产生了一种错觉，似乎这些山本是天边的一轴画，只是偶然被风吹断了卷轴，斜斜地铺下，垂在地上，皱皱沓沓堆作了层层的山。

山与城市为邻，很自然地褪去了野性，沾染了些许文化气息。而在这些文化味颇浓的山上又大都建有寺庙，或皇家气象，或质朴平凡。寺庙是凡人依照自己的理想，给神仙建筑的住所。远避喧嚣，守卫心灵的园地，来往于寺中的人们，总想依托山的灵性，超脱了自己的灵魂，殊不知山却正借寺的雅致点缀了自己，如此说来，赏山的人赏的非是自己的心灵。

山是如此，城也是一样。

文·丁辉

“盗亦有道”及其他

可得乎？1980年代所以让人怀念，或许部分在于那个年代犹存一丝古风。我有一老家邻居，就称之为“马扁”吧。时值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计划生育，马扁在乡间卖一种“药”，称吃后可以生男孩。我问马扁：你就不怕人家生了女孩找你？马扁说：我讲明了，这药只有50%的功效。我恍然：这跟生男生女的几率正差不多。马扁又说：“我这人忒讲诚信，万一因药物”无效”生了女孩，钱全部退回。其实说到底，就等于向生了男孩的人家讨个喜钱，而且也不多，就200块钱，本来就没事，要多了，可就太缺德了。还有我那药，其实就是我们家自制的点心，绝对绿色食品，确保无害。拿生男生女蒙人，已经不地道，若再让人吃出个好歹，那可太缺德了。”听他左一个“太缺德了”，右一个“太缺德了”，我强忍住笑，可马扁说得郑重其事，一点也没有“幽默”的意思。

鲁迅在给曹聚仁的一封信中说过这样一段话：“现在做人，似乎只能随时随地点点有益于人之事，倘其不能，就做些利己而不损人之事，有不能，则做些损人利己之事。只有损人而不利己的事，我是反对的，如强盗之放火是也。”鲁迅在《再论雷峰塔的倒掉》中将破坏分为两种：寇盗式的破坏和奴才式的破坏，并且认为奴才式的破坏因其更普遍，危害要远甚寇盗式的破坏。鲁迅思想里有许多矛盾，此即是一例。寇盗式的破坏的危害之大恐非奴才式的破坏所可及。奴才式破坏固为有害，然只是“因目前极小的自利，也肯对于完整的大物暗暗的加一个创伤”，以前引先生致曹聚仁信中所言绳之，尚属“损人利己”级别，最起码并未深乖人性；而“寇盗式”的破坏却专事破坏，如强盗之放火，被“放”者固然无辜可归，可谓至惨，对施“放”者亦无一毛钱好处，正属先生反对的“损人不利己”。张献忠杀人自然可怕，然

更可怕的是他似乎只是“为杀人而杀人”，这和“为放火而放火”，正可凑成一对！这已经不是人性，而只能算是“恶魔性”！鲁迅对奴才之深恶甚于寇盗，带累“奴才式”的破坏”也遭陪绑。其实，寇盗与奴才，岂可别哉？所谓“临下骄者事上必谄”，寇盗在合适的时候会变身奴才，奴才一旦有了机会亦可侧身寇盗。还拿张献忠说事，当其面对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，何尝手软过；然满洲的皇太极大兵一到，乖乖地躲进深山，不敢露头。说句会让民族主义者气馁的话，“肅王一箭”，岂非上天在佑护川蜀子民！

损己利人，甚至毫不利己，专门利人，是道德高调，不唱也罢，我对一尘不染的道德理想固从无兴趣；利己而不损人固然再好不过，实在不行，损人利己也并非想象的好过可敬，说到底，市场时代的竞争往往就是法律框架约束下的“损人利己”而已。最可怕的是底线之下的“损人不利

己”。我就宁愿希望在路面撒图钉扎人家车胎的是修车铺的老板，而不是地痞无赖的胡闹取乐；公园或绿化带里的花是被摘或搬回去装点家居，而不是在地上蹂躏或干脆扔进沟河里；盗取车内财物就算了，不要顺带掐死车内熟睡的婴儿……

“损人不利己”之可怕尚不在这些事情本身，而在于此类事情总让人嗅到一种不祥的味道。此种味道或可谓之戾气。明末张献忠不过是此种戾气的极端例子。戾气散在民间，诗意一点的比喻自然是星星之火，其实也可以说它是一个个火药桶。“损人不利己”真正可怕者在此。

要感谢公路上“义贼”与马扁这样的“义贼”，他们若再朝前走一步，把装准考证的信封撕掉或扔了，向“男胎药”里胡乱添加一点什么，即进入寇盗。值得庆幸的是他们都有底线，于是为人性，也为我们社会留存了一线微光。



刘慈欣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年12月版